

民族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激起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各地也相继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而中国外交的红色基因，则要追溯到1931年的江西瑞金。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同年11月，在极端困苦环境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并设立外交人民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外交机构，也是我们今天的外交部前身。

延安时期，在陕北的山沟里，中国共产党采取“窑洞外交”，以“三用合一拓展”的方式进行。

首先，用好朋友的力量。主要是保持与苏联、共产国际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机构的人员的往来。

其次，用好西方记者之笔。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在陕北红色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他用图片、文字、视频等丰富形式首次将“红星照耀的地方”展示给全世界，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

再次，用好电讯和书信。在西班牙战争刚爆发时，中共就发表了大量支持和鼓励西班牙共产党和人民的文章，强烈谴责德、意法西斯。

最后，拓展与西方大国的联系。

1939年1月，基于对整个抗战形势的研究，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根本任务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南方局外事组的设立，有利于争取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改善党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

1945年，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

在此时期，党领导下的对外工作，呈现主动性和灵活性，也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苦尽甘来，新中国外交迎来曙光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准确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指导原则。

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

之后，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明确提出了“一边倒”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要求外交人员要当“文装解放军”，有铁一样的严格纪律。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先后出任苏联大使，姬鹏飞、耿飏、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10余名高级军事将领则出任新中国的首批驻外使节，被誉为“将军大使”。他们以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经过战争考验的战略眼光，为新中国外交打开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和稳定。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也随之不断上升。当时，毛泽东提出：“形势是很好的，应该派一些同志去做外交工作，做外交就是做建设工作。”

于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表现了高超的外交艺术和豁达优雅的风度，他以杰出的活动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让新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进一步被各国所认识，使中国的国际威望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杨成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间还有一段著名的“握手风波”。

在《福建党史月刊》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历史真相》一文中写道，那次会议上，美国著名的冷战骑士、国务卿杜勒斯曾下令与会期间美国代表团，任何人不得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

据外交元老们回忆，杜勒斯只出席约一周的会议就于1954年5月3日回国了，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主持美国代表团的工作。这位史密斯先生个人观点上是愿意与新中国友好的，对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新中国的做法也是有保留的。

某天，当史密斯一个人走进会场吧台去喝咖啡时，周恩来就在代表团秘书长、助理王炳南的安排下不经意地也走向吧台，和史密斯刚好相遇。因为周恩来事先已经知道史密斯对中国的态度，就装出要跟史密斯握手的样子。这时，史密斯右手夹着